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的演变与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控理论

夏立平

内容提要:国际军备控制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际军备控制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重要影响。新现实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美苏70至80年代的核军控进程起了某些积极影响。当代西方军备控制理论还包括和平研究、核威慑理论中影响核军控的理论、国家实力构成研究等。这些研究并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安全利益和特点出发,着眼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斗争的实际和发展。

关键词:国际军备控制 中国 军控理论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邮政编码:200040)

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是国际政治与军事领域的重大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利益,与现实的外交斗争密切相关。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斗争的艺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确保有利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长期和平国际环境,我们有必要在对国际军备控制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

现代西方军备控制理论的演变

现代西方军备控制的理论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逐渐形成的。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斗争更加激烈,它们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地区霸权,大规模地扩军备战。军备竞赛已经由过去某些国家之间的角逐或某个地区的斗争发展到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角逐。

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许多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队开始装备机枪、装甲车、飞机、潜艇、电报等先进装备,这导致战争的规模、强度和破坏力的大幅度增长。

在欧洲出现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斗争加剧以后,列强进一步整军经武、扩充军备,不断改进和发明军事技术,大搞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公众与

论对军备竞赛开始感到一种“恐惧感”。这成为促使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和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的因素之一。

本来这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但由于与会国家对彼此的裁军诚意表示怀疑,德国等国家又担心签订军备限制协定会束缚它们发展军备的手脚而大力反对裁军,因此会议在限制军备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只是达成了一些关于战争的法规。会议表示了“限制当前加重世界负担的军费,特别是就限制使用新型号和新口径的海军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以及“限制陆海军和军事预算”的愿望。事实证明,这些愿望并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损伤,而美国则由战前欧洲的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这为美国提供了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机会。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14点计划”,主张通过实现裁军、建立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使之适合于各国的安全生存”。这后来被称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反映了美国在特定环境下走向谋求世界霸权之路的梦想。但这也是首次将裁军与建立“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的设想相联系。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这个计划落空了,国际联盟也未能防止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的产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其主要标志是以汉斯·摩根索“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但战后初期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基本未涉及军备控制问题。

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发生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论争。传统现实主义基本上继承了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但也修正并发展了政治现实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基辛格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在70年代提出世界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平衡”,造成一个“新的世界均势”的和平结构。^①基辛格这种缔造国际关系的“和平结构”和造成核时代力量均势的概念成为影响70年代美苏核军控谈判取得进展的基础理论之一。

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给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带来了一些革新。它运用整体研究(范畴分析、内容分析、模式分析)、策略研究(博弈分析、决策分析)和定量研究(统计分析、数学分析、微机处理)等科学方法,使国际关系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提高。科学行为主义对国际军控研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80年代西方国家有一些学者在对美苏核裁军的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模式分析、博弈分析、决策分析和定量研究等方法。

在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还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斯坦利·霍夫曼指出:“这种新现实主义正视分裂的世界所造成的严峻现实,同时也努力通过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国际关系策略的运用,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造成的世界和人类的毁灭。‘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为权力和世界秩序而斗争的新现实主义必将会出现。”^②这种新现实主义强调美国的利益应通过加强合作和结盟的途径来实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美苏70至80年代的核军控进程起了某些积极影响。

当代西方军备控制理论还包括和平研究、核威慑理论中影响核军控的理论、国家实力构成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90、96页。

② 斯坦利·霍夫曼:《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载《大西洋评论》1985年11月号,第136页。

研究等。这些研究并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

和平研究

60年代以来,和平研究成为西方军备控制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平研究中对国际军备控制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

(一)关于人类面临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领域的研究。70年代中期后,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由于国际社会整体性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面临如此众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领域,如气候控制、生态平衡、保护大气臭氧层、和平利用宇宙空间、医疗保健、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国际贸易的保障、环境污染及食品供应保障和交通通讯的保障等。人类历史上,各国只考虑本国利益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任何国家在考虑本国利益时必须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否则本国利益最终也会受到损害。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些学者曾把谋求“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理想主义来抨击。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在核武器可以把人类毁灭几十次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如何谋求“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问题。这些学者的观点后来成为要求和支持核裁军的一种重要理由。

(二)关于全球进入相互依存时代的研究。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世界相互依存的时代到来了。即使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亨利·基辛格也承认“国际事务的传统议题——强权间的平衡、国家的安全——已不能解释我们的严重危险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旧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土崩瓦解;旧的口号日益失去鼓动力;旧的解释已徒劳无益。这个世界在经济、通讯、人类欲望等方面变得相互依存了。”^①列斯特·布朗把国际通讯和飞机旅行的发展看作是建立了一个“全球村”,认为社会和经济交往创立了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基欧汉和奈认为,其结果之一是“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他们还认为,相互依存并不局限于互利的场合,并不都是以互利为特征的,如在“相互确保摧毁”局面下的美苏战略僵持。这些观点后来也对裁军,特别是美苏核裁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关于核冬天理论。一旦美国和苏联爆发核战争,会对人类安全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冷战时期人们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1983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核战争以后的世界”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名叫TTAPS小组的5位科学家(TTAPS是这5位科学家姓氏头一个字母的组合)正式公布了他们的一项惊人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成果提出,核武器除具有通常所熟知的热(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沉降物和电磁脉冲干扰等5大破坏因素外,还将产生第6个不为人知的灾难性后果——对地球气候的改变。一场全面核战争所产生的数亿吨尘埃和烟灰将把整个地球笼罩起来,遮断阳光的照射,引起内陆和海洋气温的骤降,造成长达数月乃至逾年不见天日的黑暗和严寒。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使植物的光合作用中断,导致各类动物物种的大范围死亡,甚至严重危及人类的存活,将再现恐龙灭绝的自然景观。这就是“核冬天”理论。尽管这一理论还不完全成熟,但已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广泛重视和密切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结果预测,一场全面核战争产生的冲击波和其他瞬间危害将使全球10亿多人死亡,另外10亿人受伤。即使在这种核打击下仍幸存下来的1/3的居民,也要

^① 亨利·基辛格:《新的国家伙伴关系》,1975年1月24日在洛杉矶的演讲。

面临核冬天的可怕威胁:在每一个核爆炸发生地点的上空,都会腾起一股巨大的由尘土和烟灰构成的蘑菇云团。这股云团上升到大气层8千米至16千米乃至更高的地方,然后沿着水平方向向四处扩散,很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铁钻云,接着又合拢到一块。核打击次日的清晨将没有黎明,中午时天空仍会一片漆黑,这种黑暗将持续若干个星期。在此期间,气温将日复一日地下降。在大陆内地,气温总计可能下降40°C,这足以变夏日为冬日,变冬日为北极的冰天雪地。至于在沿海地区,例如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会少得多。这是由于海洋温室效应的缘故。但即使如此,沿海地区气温的变化也足以变夏季为冬季了。核冬天将给地球上的植物、动物和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甚至可能毁灭人类。

核威慑理论与军备控制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核武器的问世和美苏冷战的开始,威慑理论和政策在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逐渐成为美国战略理论和防务政策的主导,其核心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

美国军界、政界和学术界对威慑的概念有多种解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

——美国《国防部军事及其有关术语辞典》1984年英文版的解释是:“威慑是使对方因惧怕不堪设想的后果而不敢采取行动。威慑是由于使对方受到确实存在的难以承受的报复行动威胁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①

——美国前总统里根认为,威慑就是“使考虑袭击美国或者我们盟国或者我们切身利益的任何敌人确信,他们冒的风险远远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②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认为:“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要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敢采取某种行动”。^③

这三种对威慑概念的解释大同小异,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使对方确信它的某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将使它无法承受,或者它采取这种行动所冒的风险将远远超过它所得到的好处;二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对方不敢采取这种行动。

威慑要素是指构成有效威慑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它通常是由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威慑信息传递三部分构成,三者缺一不可。

——威慑力量:或者叫实力,是威慑的物质基础,它必须具备可信性。核威慑力量要具备可信性,就必须具有有效的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

——使用力量的决心:就是在遇到威胁时把威慑之剑高悬在对手的头上,从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在核战略中,使用力量的决心必须要通过能够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和具体方案来表达,而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语言上。

——威慑信息的传递:威慑首先是将国家实力及使用实力的决心作为信息传递给对方。当对方逐步接受这种信息,心理上的压力达到一定量时,就能获得威慑效果。如果只有威慑一方的实力和决心,而被威慑一方没有获得上述信息或获得的信息不准确,同样不能构成有效威

① 转引自《简明美国军事百科全书》(方未之等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1年,第266页。

② 里根1983年3月23日的电视讲话。

③ 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47页。

慑。

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学术界和军界曾围绕着核时代的特点和威慑战略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1946年耶鲁大学伯纳德·布罗迪教授在其主编的《绝对武器:原子能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美国现代威慑思想中关于“核威慑”、“相互威慑”、“第二次打击”等战略概念,这些战略概念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威慑战略的理论基础。

基辛格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也对核威慑战略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他在该书中指出,核时代最基本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在威慑政策和该政策失败时的实战战略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战略理论的目的是把每一行动方针的有利之点结合起来,但同时却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险”。^①可以说,战后美国的核威慑理论与战略,就是在探索如何将威慑和实战这两种方针的“有利之点”结合起来的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

美国兰德公司的学者在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战略研究,从而使威慑理论科学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对核威慑理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是将“博弈论”和“系统分析”两种方法引入威慑理论的研究领域。^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核威慑理论的某些部分成为核军控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

一、“相互确保摧毁”理论。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美国奉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理论,前苏联也逐步接受了这一战略理论。根据这一战略理论,美国提出,核军控的重点应该是减少那些促使任何一方首先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因素,确保双方进行核报复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当时它认为,一方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可能威胁到另一方的报复性的威慑力量”。因此,美国主张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同意将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向上平衡”。

二、“相互确保生存”理论。198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并主张用“确保生存”理论来代替“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此后,“确保生存”理论又发展为“相互确保生存”理论。从那时至90年代初,美国的核军备控制理论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主张在核武器数量上“向下平衡”,同时直到冷战结束时不允许苏联达到限制美国发展战略防御系统的目的。

三、“进攻性力量与防御性力量相结合的威慑概念”。2001年5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提出:“我们需要制定既依靠进攻性力量,也依靠防御性力量的新的威慑概念。”^③他认为:“威慑不能只依靠报复性的核威胁。防御能够通过减少扩散的因素来加强威慑力量。”虽然布什主要是想以此作为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理论基础,但他也表示“这一新的构想必须鼓励进一步削减核武器”。^④

美国延伸威慑战略思想与军备控制

“延伸威慑”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奉行的军事战略和核战略指导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向美国的盟国(包括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国)提供保护伞,在冷战时期,强调运

① 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纽约:哈伯与兄弟出版公司,1957年,第132页。

② 参见姚云竹:《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③ 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2001年5月1日在美国国防大学的演讲。

④ 同上。

用核武器威慑前苏联,不论前苏联对美国本土或盟国发动核或常规进攻,美国都准备以核武器进行回击;在冷战后时期,坚持以核武器威慑对手或潜在对手,以慑止它们用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海外美军和美国的盟国。

“延伸威慑”是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格局下,美国力图凭借其军事、经济和技术优势(核武器就是当时高技术的结晶),充当世界领导,维护它在世界范围既得利益的产物。在40多年的冷战时期,这一战略思想虽然不断有所调整,但是它的实质基本上没有变化,表现出下列鲜明的特点:

——把苏联看作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和在世界范围争夺影响的主要对手;

——高度依赖核武器,核武器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

——通过对盟国提供核保护伞,把美国自身的防务与盟国的防务联系起来,实际上达到控制盟国,以及在尽可能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保卫美国自身安全的目的;

——以欧洲为中心,第一位目标是确保西欧不落入苏联控制。美国在战后不久(1949年),即推动成立了北约军事集团,以核武器为后盾,与随后形成的华约军事集团在欧洲重兵对峙,这成为美国与苏联以及东西方军事对抗的中心。在亚太地区,美国也向其在该地区的盟国特别是日本提供军事保护伞和核保护伞。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延伸威慑”战略思想。从现在来看,美国为了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还不想完全放弃“延伸威慑”战略思想。它仍把核威慑作为其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向日本和其北约盟国提供一定程度的核保护伞。同时,它也对“延伸威慑”进行了重要调整。例如,由主要对苏联进行核威慑转变为既对俄罗斯进行核威慑,也对拥有或可能拥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核威慑,甚至企图用核武器慑止某些国家对美国军队及其盟国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可以认为,奉行“延伸威慑”战略是美国至今不肯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向日本和北约盟国继续提供核保护伞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防止日本、德国拥有核武器。

“延伸威慑”战略思想对军备控制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对核裁军产生阻碍作用。美国由于奉行“延伸威慑”战略,不肯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使美国不仅需要拥有第二次核打击所需的核武器,而且需要第一次核打击所需的核武器,从而导致它难以对其战略核武库进行进一步大幅度裁减。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延伸威慑”战略有助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的核保护伞使日本和德国不需要拥有核武器,美国的核威慑也减少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或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动因。

国家实力构成研究与军备控制

现代西方学者对国家实力基本要素的分析为人们研究一国实力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其观点可分为三个学派:

1、定性分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雷蒙·阿隆和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把国家实力归结为三大基本要素:A.所占据的地理空间;B.资源(包括物质和人力);C.集体行动能力,涉及到军事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等。汉斯·摩根索则认为国家实力的构成主要取决于9大要素: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状况、人口、民族特性、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

2、定量分析学派,又称为行为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没有把国家实力中的各种因素进行分解、量化,而没有量化的概念便不准确、不科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多伊奇和史蒂文·布拉姆斯。卡尔·多伊奇在他的《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提出了“权力份量”的观点,并用这种观点研究国家力量。史蒂文·布拉姆斯依据交往关系对权利及影响力进行了测量。

3、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克莱因。他把力量要素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对国家实力综合计量的公式,又称“克莱因公式”: $P_p = (C + E + M) \times (S + W)$ 即:国家实力 = [(人口 + 领土)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 (战略意图 + 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

克莱因的上述研究成果对后来其他国家学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而冷战结束后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使许多国家提高了对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推动国际军备控制起了一定的作用。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我国外交政策为依据,从我国的安全利益和特点出发,着眼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斗争的实际和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的指导思想

(一) 和平与发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的时代背景。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历来是关系到制订我国国家总体战略和对外战略的决定性问题。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一直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和对当代人类社会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他认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非常突出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源;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制约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第三世界,维护世界的长期和平是有希望的。

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中国高度重视军控与裁军工作,将其作为总体外交及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的目的。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可以概括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争取和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一个是国际条件,即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要发展,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也需要和平。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符合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备控制进程,支持国际社会为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争端、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所做的努力,是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种重要手段。而要争取和平,就要同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参与国际军备控制进程中进行这

种斗争,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

(三)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的出发点。

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在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作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1988年1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当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①

邓小平倡导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的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邓小平指出,过去搞的无论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还是区域性的霸权主义,现在都应该停止,要努力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事务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各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国与国之间要倡导以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和争端,通过求同存异、平等对话来解决分歧,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政策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手段之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也必须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战略高度出发,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

(四) 使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的着眼点之一。

邓小平在1990年曾经说过:“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取得可喜的进展。他们与西方学者普遍运用的以强权政治为出发点研究国家实力的观点不同。中国学者认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具备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实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能力,一般认为应该以“综合国力”这个概念来表述。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的总体力量,主要指由该国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人口、经济能力、防务能力、科学技术水平、政治的和心理的凝聚力、民族精神素质等因素形成的。^②

综合国力的研究导致人们对军备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军备观念是军备越多,能力越强。但今天却出现了一些由于过多地发展军备,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发展的例子。冷战的结束也导致许多国家对安全概念的理解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升;军事手段仍然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手段而为各国所重视。随着世界各国注意力更多转向国内经济建设,同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各国经济上的交往大幅度增加,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加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各国更多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避免采用极端的军事手段,使矛盾激化。而两个超级大国在长期的冷战时期着力进行军事竞争,结果造成一个崩溃、一个实力明显下降的局面,也从反面使不少国家从中汲取教训,认识到仅仅依靠军事上的强大,最终未必能够保障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所有这些,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安全政策上,几乎都把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军备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② 参见金应忠、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64-165页。

要。综合国力的概念也是中国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末进行大幅度裁军并积极推动与邻国建立信任措施和国际军备控制进程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应有的风格和特点

在邓小平理论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的指导下,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中国的军控与裁军政策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种风格和特点应该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有:

(一) 强调全面、彻底性。

中国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国际军控和裁军问题,而是把它放到总的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中去看,主张军备控制的目的应是有利于维护和增进各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中国也不单只是要求裁减核武器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而是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认为裁减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都只是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过程中的必要措施和步骤。在裁军目标的全面性和彻底性方面,中国是坚定地站在广大中小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一边的。

(二) 重视系统性。

中国重视国际军控和裁军问题的内在联系,在许多军控和裁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系统的主张。例如,近年来中国多次提出完整、相互联系的核裁军进程建议,既确定了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最终目标,又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

(三) 主张平衡性和均衡性。

平衡性主要指应平衡考虑裁军和主权国家进行正当自卫的军事需要,以及在某些防御性武器问题上应平衡考虑人道主义和主权国家进行防御的需要。

均衡性主要指对有关国家武装力量的裁减应在均衡的原则下进行,不应使某些国家获得超出其自卫需要的武器。

(四) 争取公正性和合理性。

中国一贯主张将公正、合理作为国际军控和裁军的其中两项主要原则。正是根据这两项原则和均衡的原则,中国在冷战时期就提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应该率先大幅度裁减核武器的主张。冷战结束后,中国反对一些国家搞双重标准,一方面打着防扩散旗号,施加压力,动辄制裁或威胁制裁别国,另一方面自己却向敏感地区大量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侵犯他国主权,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同时,中国主张,不应为了防止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禁止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以及阻碍化工领域为和平目的的国际贸易、科技交流与合作。

(五) 要求平等参与性。

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都应有权以平等地位参加裁军问题的审议、谈判和监督有关协议的执行。例如,中国认为,应在所有有关国家普遍参加的基础上,谈判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防扩散制度;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实现国际防扩散的共同目标。中国这一主张受到广大中小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责任编辑:于铁军)